

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

关于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维汉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根据记录整理

时间：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地点：中国革命博物馆

到会者：郭旗生、张敬德（教育部政教司）；胡华、戴鹿鸣、何沁（中国人民大学）；张静如（北京师范大学）；向青（北京大学）；金再及（北京工业大学）；郑小筠（清华大学）；夏立平、黄高谦、沈庆林、季国平、方孔木、陈继新、高荣光、苏东海（中国革命博物馆）

这个会是教育部发起的，你们提了二十二个问题要同我座谈。这些问题是你们在编写党史教学大纲过程中提出来的。我看了两、三遍，有些问题我解答不了，有的问题也不是由一个人能解答的，于是我写信给教育部的同志说还是由少数人漫谈一次，并请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参加一起谈谈。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在会上提出来，可以各抒己见，有的你知道我不知道，有的我知道你不知道，大家来凑一凑；同时，对问题各有各的看法，大家谈一谈，议一议，这也是民主集中。大家提问题，一个人回答，这样搞不好，没有哪个人知道的那么多的。许多人说我知道的很多，说实在的，我知道的很少，不一定年龄老就知道得多。所以，我赞成我们搞成一个座谈会。

（胡华同志谈了关于历史人物研究会的情况，并说：上次李老讲到

白洋淀的烈士碑上刻有许多烈士的姓名，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哪怕几百字的传记也是好的，把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的事迹都写下来。现在烈士家属都很积极，各地党史教员、博物馆、纪念馆的研究人员也很积极。）

过去写了一些烈士传，不过它的范围是中上层，中下层没有人管。我同温济泽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没有下就没有上，没有中下就没有中上。我们革命的成功，不是只靠少数领袖，不能没有广大的群众。领袖也有几种：有全国的领袖，全民族的领袖；也有一个地区的领袖，基层的领袖。一个工厂、一个农村都有领袖。讲革命，那一个地方都有领袖。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他们许多人是全国性的领袖。我到过白洋淀，到过四方，两个地方都有烈士碑。用照相机把它拍下来，登在刊物上，很有价值。有的虽然只知道姓名，他是张三，或者还知道是那个地方的人，什么时候牺牲的，就这么几个字，也是好的。没有千千万万无名烈士，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值得后人纪念。我是主张中上层的烈士要写，中下层的烈士也要写。即使知道的不多，只一、两行字，也是一个传。只要把它登出来，当地的群众、党支部就会受到鼓舞。你把白洋淀烈士碑登出来，讲他们当时是如何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他们那个地方就会很受鼓舞。这也是传统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搞党史，搞革命史，不搞这方面的工作是不完全的。

郑州开了一个会，成立了一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他们有同志来了，要我做会长。我说我很赞成你们成立这个会，但会长我不能做，能力不行，身体也不行。我已经不能担任实际负责的工作，搞点党史资料，也要请别人帮忙才行。

党史是个大厦，是一九五九年的十大建筑不可比拟的厦。大厦是靠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的。我现在就是收集点砖瓦，搞点党史资料。人家说我在研究党史写党史，这是传说，现在我正式声明，这不是事实。

要说写回忆录，也只写了一篇《回忆新民学会》，是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帮了忙才写出来的。现在中央还没有写党史，现在写党史很难，历史上有些问题还搞不清楚。你们提的问题，很多我个人也不太清楚。

写历史就是一个写人，一个写事，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写人也好，写事也好，一定要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历史是发展的，人也是发展的。现在写人物，我看有些问题。

你们说《杨开慧》这个戏怎么样？

（胡华同志：《杨开慧》这个戏有些地方与历史事实不符。方孔木同志：《杨开慧》戏中讲，一九三〇年毛主席从井冈山派人去找杨开慧，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毛主席一九二九年就下井冈山了。）

我听说过一九三〇年第二次打长沙时，毛主席的队伍也到了长沙附近，那时毛主席派人找过杨家。不知道究竟如何。

《杨开慧》这个戏，我是从电视里看的。看了以后，觉得有几个原则性的问题。曾经和刘复之、周扬同志谈过，也同导演和作者详细谈了我的意见。

这个戏写的是真人真事。写真人真事也可以采用某些传说和虚构，但基本事实应该是真实的。杨开慧是一个近代的人，真人真事，有许多同时代的人是知道的。而且这个戏的内容牵涉很广，不只是写杨开慧一个人。例如《杨开慧》里面写了一个陈独秀的女秘书，这完全是虚构（陈独秀的秘书现在还活着，还在北京工作）。那个女秘书是什么人？一开始出场就不是好样的，最后叛变当了敌人的奸细、侦探，带人去逮捕杨开慧。说陈独秀搞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我们党的组织还是严谨的，陈独秀不可能在街上随便找个女的当秘书，这是不可能的。陈独秀当时是党的总书记，他要一个秘书，一定要组织部或秘书处给他找，他怎么能随便找这么一

个不好的女秘书呢？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样虚构，损害了我们党的组织面貌，这是不可以的。关于《杨开慧》这个戏的缺点，我只举这个例子。

现在谈谈写领袖人物、英雄人物的问题。特别是写伟大的领袖人物，要注意他同几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一是他同群众的关系；一是他同党的领导的关系；再一个是他个人同本单位的集体领导的关系（包括同干部的关系），不能写成个人指挥一切。

我愿意介绍一些我所知道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情况。当时，一九三一年王明宗派首先把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取消了，一九三二年又把他在红军的领导职务取消了。他没有承认强加于他的路线错误。但是，他非常守纪律，服从多数的决议，而且还尽可能争取在当时中央局许可的条件下，搞查田运动，搞国民经济，搞乡村调查，搞政权建设，做各种群众工作。一切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那时是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搞赤白对立，招来经济封锁，苏区与白区商品不能流通，也不晓得搞生产，生活非常艰苦。一切为了前线，前方饭可以吃饱，但油盐淡薄。后方机关人员则饭也吃不饱。拿我来讲，那时上午工作到十点多就饿得厉害，只好在铺上躺一躺，休息一会儿起来再做事；晚上十点左右也是这样。现在的日子多好啊！真是天上、地下！毛泽东同志关心群众的生活，他所做的工作，归根结蒂，就是要使群众的生活搞得好一点。他在非常不顺利的环境中，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实在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典范。他在中央苏区的威望很高，军队是拥护他的，群众是拥护他的，干部是拥护他的，如果他不是采取这个态度，党可能分裂，以后还有什么遵义会议？他对王明路线也是抵制了的，什么富农路线，什么游击主义，他都没有承认。王明宗派说过，山沟沟里那里有马列主义，他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从大城市来的，自称马列主义在他们手里。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就利用那个机会，

认真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他在那个时候，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是尽可能在党的领导下做点工作，一个是学习，真是模范。

看见有的戏剧，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马日事变后，要湖南来的同志回湖南搞武装暴动，这也不符合事实。当时中央处理湖南事变是和平解决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也赞成和平解决。即使他并不赞成，但他是中央农委负责人，也不会单独行动。《杨开慧》里面看不见毛泽东同志同中央的关系，也是一个缺点。

下面再举几个不符史实的例子。

向警予同志是应该歌颂的。她做过很多工作，是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但是歌颂要符合事实。最近，一个纪念她的戏叫《中原烈火》，开幕前一个同志作介绍报告，说向警予同蔡和森、周恩来在法国组织共产党，这是没有的事。蔡和森和向警予在共产主义小组时代，已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以后终身坚持下去，历史地说，也是属于共产党的创立者的行列。但他们在法国并没有来得及参加组织共产党，却是事实。又说她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妇女部长。有的同志告诉我，她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做过妇女工作，但不是部长。

还有好几个写“马日事变”的戏里，有一个中央特派员，做了许多坏事，以致叛变当了特务，最突出的是广东的《秋收辟野》。其实，历史上并没有所谓中央特派员。但那不能怪作者，因为他们有书为证。但那个书写的并不符合事实。

还有一个法国建党的问题也很乱。最近，法国树碑纪念周恩来住过的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哥特伏化街十七号旧址，人民日报在几天之内有两篇报导就不一样，一篇说有蔡和森，一篇里没有提蔡和森。其实，当时和森已被强迫遣送回国。人民日报在五四纪念会以前还有一篇通讯

文章说，周恩来和蔡和森在巴黎圣母院的顶上谈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说是日本人在什么书上写了的，中国有当事人在嘛，作者究竟调查核实了没有呢？也还有这样写的，说周恩来同志到了法国，加入了“工学世界社”，领导“工学世界社”建立共产党，这是完全没有的事。当时，我们还不认识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是中央旅欧组织的创立者，并且是它的主要领导人，我在《回忆新民学会》中已经说到，这里不重复了。蔡和森在法国是想建党，但是没有来得及，他是在回国以后加入党的。巴黎有共产主义小组是另外一个问题，建立共产党又是一个问题。写历史，事实一定要落实。

最近，听说湖南还有一个演郭亮的戏，说“马日事变”以后，他在岳麓山开了一个会，决定农军攻长沙，这也是没有的事。他的爱人证明，他第二天就离开长沙，接着跑到武汉，后来参加南昌起义去了。

上面举了几个例子，不必再举下去了。

我们搞历史，一个人，一件事，千万千万要实事求是。什么是实事求是呢？一个求“实”，一个求“是”，要求“实”第一。求“是”和求“实”是互相作用的，但基本的是求“实”。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动摇，如果不清楚，宁肯说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如果不知道，宁肯缺在那里，说这个问题我们还不知道，还待查明。要采取这样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才对。勉强写，写错了，不好，核实是错了的，就要改正。有错必改。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严肃的。要有实际，才能求“是”，有了唯物，才能辩证。我看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道理是对的。强不知为知，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这个问题我们搞党史的同志要非常严肃。评论可以有各种看法，但是先要求“实”。如这个茶壶，确确实实

是个茶壶，这才好评论，你可以说它美，可说它不美，可以说它那个地方有缺点，可以各有各的看法，经过辩论，得出能够反映客观的结论。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遵照列宁讲的，任何问题都要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内，而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评论。有人评论向警予在二十世纪初已紧跟毛泽东同志，这就违背了列宁指示的原则。

要求实，就要真正的去调查研究。我建议搞党史的，写党史材料的，搞党史教育的，也要走出门去调查，坐在屋里搞不好党史。调查的材料要十分丰富，然后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发现不足，再去调查。讲京汉铁路罢工，就应该到长辛店、郑州、汉口去调查一下，有些人还活着，那你讲起来也生动。讲上海三次暴动，也可去调查一下，不要只是去抄书。搞党史要求实，不能简单抄书，那就要花点苦功。一个五四运动，一个建党，一个北伐战争，隔了几十年了，活着的人很少了，不作一些艰苦的调查工作，有些事是搞不清楚的。不实事求是，就会害了自己，更会害了后代。写的东西要注明是从那里引证来的，以便别人再去研究，不要一点都不注就自己写成一本书。写成书，人家还是要提出问题，问你是那里来的。同志们现在是党史教授，写党史课本，搞党史资料，必须搞这个工作，认真调查研究。当然，要百分之百准确，谁也不敢保证。那样要求，谁也不敢搞了，成了禁区了。禁区要不得，但是要实事求是，要严肃，尽可能去作。

天津大学写柳直荀传，质量如何我不清楚。听说他们有几个同志到湖北洪湖地区调查了半年，来回几千里，找了许多人，终于找出了直荀烈士被害的具体情况。这种艰苦调查的精神值得称赞和学习。

要搞调查研究，特别是建党和北伐时期的，困难很大，了解情况的老同志越来越少了。我也是一个被抢救的对象，不晓得那一天我就跑掉

了。我见到老人就劝他们写资料。“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说你留点东西才是宝贵财富。有的老同志说，我是在基层工作的，只知道那个基层，或者说是搞局部工作的，只知道那个局部。我说，没有基层就没有上层，没有局部就没有全局，全部是由许多局部组织起来的，上层要有比较广泛的基层，才会有真正强有力的上层。所以，我们搞资料不要轻视基层，不要轻视局部。我说一个砵也要把它拓下来，当你孤立地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往往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有时候遇到了与这个东西有联系的情节，它就会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要看轻基层，不要看轻局部，有时候就是一个基层帮我们解开了一个疙瘩。昨天我看到李新同志那个关于李大钊同志的报告，很多都是实际材料。搞资料还是朴素好，那些夸夸其谈的东西千万注意不要去采纳。抄是要抄的，不要简单的抄了就算。有些现存的好东西不抄怎么行呢？但要经过核实。我劝同志们不要搞迷信。老干部讲的都对吗？完全可能记错。谁的东西都要经过核实，就是很负责的人现在讲的，你也要经过核实。这些老人，忙得很，特别是这些负责人忙得很，你一下子提一个问题，他不答复是官僚主义，他要答复不一定记得很清楚，你就拿他一句话当作根据，那不行，还是要经过调查核实。总之，实事求是，不管谁说的，要经过核实，搞不清楚的宁肯缺一下，问题搞不清楚不要勉强写。

还有一个写人的问题。过去老干部没有犯错误的，我看很难找到，犯的错误有大小，犯路线错误的也不少，但后来改了。现在写人，凡是一个应该歌颂的，总要把他写成是“完人”“足赤”。现在报纸上就有这样的纪念文章。歌颂一个伟人、一个烈士，当然不要去述说他的缺点错误，你绕过去就行嘛，或者在必要时提一下也行嘛。张闻天的悼词就是用的

这个方法。但本来是那个地方有黑点，你给他涂点胭脂水粉干什么呢？这是做假。本来是一个曲线，你要改为一直上升，这不是唯物主义，不是辩证法。这样的事情不少。还有一种现象，评人物早晚市价不同，不是按历史本来面目，而是看风使舵，这是康生、林彪、“四人帮”的作风，必须改掉。

我今天讲的话，听起来有点味道不好。但都是近年来实际接触中积累起来的一些感想，是交心话，也是自策自励的话。

我们搞研究工作的不要搞个人权威。什么是权威呢？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才是权威。有人当面说我是权威，我总是把它驳回去。从历史上讲，我不是权威，我在历史上犯过路线错误。从现在讲也说不上权威，我对党史没有研究。你说我记得，实际上有许多事我不知道，知道的也有许多记不清楚。

各高等院校的党史教研室和党史教授，是整理研究党史的骨干，实事求是地把这件事做好，就对党史大厦和传统教育作了重大贡献，相信一定能做出很好的成绩的。

（第一次讲话完）

供研究参考
不可引证

关于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维汉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二)

根据记录整理

时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

地点：中国革命博物馆

到会者：同前

第一个问题：你们提出关于党的创立，应较多地反映上海发起组和北京小组的活动，对于毛泽东同志和湖南小组的活动应如何评价和反映？

我认为凡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活动，并且终身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同志，都可以算是党的创立活动的参加者。党的一大，是代表他们的代表大会。建党时期要写毛泽东同志和他所领导的活动的話，就要从1918年新民学会说起。因为新民学会会员中和一部分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组织的工学世界社的成员中，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有不少人实际上起着类似“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作用。后来又毕生为共产主义奋斗。从广义上说，他们也是参加了建党的活动，这是一。

第二，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和肖子升等发起的。他们到北京经过杨昌济先生同蔡元培、李石曾接洽后，在湖南青年中发动了这个运动，影响所及，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广泛的运动，一九二〇年留法勤工俭学生达到一千多人。勤工俭学运动的结果，最初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活动和团体，一九二二年六月在法国建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随后一九二三年建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

旅欧总支部，包括法国、比利时、德国三个支部。旅欧支部的成员，后来大多数去莫斯科经短期训练，先后回国，担任了党的各种负责工作，有的在中央，有的在省里。从对建党的贡献看，勤工俭学运动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

第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书社就是一个传播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李大钊、陈独秀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个书社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时才被封闭。

第四，毛泽东在湖南同社会知名人士一起还发起俄罗斯研究会，介绍青年到苏联去学习。肖劲光、任弼时就是他介绍去的，以后还有其他的人。这也算是一件事。

党是集体创建的。毛泽东同志是重要建党人之一。毛泽东同志自己承认曾受李大钊、陈独秀很大的影响。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毛泽东早。

建党期间（一大以后至一九二三年），毛泽东为首创立的包括安源在内的湘区工作，应该说是一个典范。说典范，也并不是唯一的。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的革命活动范围很广，东西南北跨了好几个省市，包括内蒙、东北、山东、河南、陕西、京汉铁路，总而言之范围很广，工作很有成绩，也是一个典范。可能还有其他的典范。

第二个问题：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如何？应如何评价和反映周恩来同志及旅欧支部在建党过程中的作用？

这个问题上面已提到一点，我在《回忆新民学会》中也说了，应该认定周恩来同志也是创党的重要人物之一，不应该拿是否参加一大作为谁是创党战士的框框。

第三个问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为公开活动的旗帜，对于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领导权应如何估计和表述？

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争论吗？

（戴鹿鸣同志：大革命时期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后的领导权不一样，当时以国民党为旗帜，党起了很大作用，领导作用、推动作用都有。但我们又觉得领导权不完全，主要从军队和政权看，还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胡华同志：《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件上写的是“领导下”，后来毛泽东同志把它改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我们对领导权掌握的不是那么全面，如何提法更好？）

对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分为三个时期。他说，第一、二个时期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三个时期是陈独秀主义占统治。第一、二个时期路线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三、二〇”事件的处理是犯了错误的，那是一个比较显著的错误；还有开国民党“二大”时，国民党右派是陈独秀送回广东去的等等。这些都是陈独秀、张国焘亲自搞的。就整个时期说，没有千方百计地抓军队实权，这是最重要的失脚，是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政治上看北伐战争怎么能起来？反帝、反封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是旗帜和纲领，与我党最低纲领基本相同，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它代表了全国广大人民大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利益，是共产党提出来帮助孙中山制定的。这就是从基本上说，第一次大革命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一个根本点。

其次，因为有共同纲领，国民党是按照这个纲领改组的，所以右派有的被排斥出去，开除出去了。国民党改组前只剩下很少数的上层，还有几部分军队。孙中山到后来很可怜，他为什么接受俄国帮助，接受中共帮助？因为他没有出路了。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没有搞成一样事情。

他本人是革命的，但道路错了，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正确的路线，这是共产党帮助他找到的。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因为他要革命，所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表示要以俄为师。

第三，我们当时在保持共产党独立性的原则下，公开拿的是实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的旗帜。这是对的。按照上述共同纲领改组后的国民党，便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同盟，共产党不仅自己举起这个旗帜，而且应当把它插到全中国，成为全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旗帜。我们党这样做了。当时国民党已四分五裂，跟随孙中山的只是少数上层和几部分军队。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它日益变成了人民大众的民族民主革命联盟。以湖南为例，我们在湖南组织国民党时，只有一个老国民党员，叫丘维震，当律师。还有一些上层分子如谭延闿，程潜等都不在湖南。北伐战争前湖南的国民党是共产党给重新组织和发展起来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成员大多数是革命分子。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省党部及各县和基层党部的领导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县党部基本上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其他革命分子。北伐胜利后，情况复杂化，但基本上仍然保持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论述的状态。那时我们的工会多是整体加入国民党，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员也加入国民党，也有农民协会整体加入的，还有许多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妇女和自由职业者等等也加入了。因此，国民党成了人民大众广泛的革命联盟。

第四，实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是一个很好的旗帜，我们拿着它可以到各阶层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活动，从中组织、领导和教育他们，并吸

收先进分子入党。北伐战争期间，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县，有我们的党员和党组织，哪里就会有青年团，有工会，有农民协会，有学联会、妇联会、教职员联合会、商民协会，有国民党组织，它们结成各界公团联合会。在农民革命已经夺取农村政权的县份，正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那里的县知事就没有了权，“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从。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

第五，军事方面的问题，一是建立新的军队，二是改造旧军队，三是武装工农，我们党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帮助国民党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每期招生各省党组织都依中央通知择优选送党员、团员、和非党团员青年入学，毕业后派在国民革命军各军工作。首战东征，平定刘、杨叛变，黄埔军校都起了决定性作用，以后北伐战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共产党员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北伐各军的政治工作，大都是共产党员负领导责任，政治工作在提高部队战斗力，维护部队纪律，动员群众参战等方面，做了充分有效的工作。在北伐战争中，粤、赣、湘、鄂等省都组织了工人自卫军、农民自卫军。这些军事工作的收获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北伐战争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叶挺部队始终是英勇善战的模范；第二，叶挺、贺龙、朱德所部成为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叶剑英所部成为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还有武汉政府警卫团参加了湖南秋收起义；第三，在湘、粤、赣、鄂的工农自卫军，成为以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红军的基础；第四，为以后长期革命战争准备了第一批军事领导人才，如朱德、周恩来、叶挺、贺龙、叶剑英、段德昌、周逸群、陈赓、刘志丹、邝继勋等许多同志。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在于：第一，党处在幼

年时期，缺乏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认识；第二，陈独秀为首的中央不主张共产党独立组织军队；第三，对改造旧军队没有经验，一般政治工作是努力做了，但没有着重注意争取因以上军官的工作，而这是有可能的，贺龙同志就是一例。以后彭德怀、吉鸿昌、董振堂等同志的起义，以及某些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便是证明；第四，中山舰事件时，我们有条件打倒蒋介石，但被陈独秀的让步妥协政策阻止了。

还有一个政权的问题，没好好地抓。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有没有指示，我记不得。广东的情况，江西的情况，我不清楚。湖北是董必武同志当主席，可能是左派政府。政权实质上就是政权民主化和实行三大政策纲领的问题。就湖南说，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和夏曦同唐生智见面，我要求他实行三大政策，给工农群众运动以支持，他要求共产党帮助省政府，彼此都应允了。他提出要我们派县长、厘金局长，因为在旧制度下，这都是直接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我们没有答应，以“共产党员不做官”应付过去。这也表示我的幼稚，没有用实际行动去改造旧政权的认识。随后我们经过国民党部同省政府协商订了一个施政大纲。在北伐军占领长江武汉以前，他们大体上是执行了的。我们有郭亮、易礼容、柳直荀充任省政府委员但无实权。同年十月，中共湖南省党代表大会提出召集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实行民选乡、县、省政府。唐生智集团借故敷衍。但是在革命高潮中，群众创造了自下而上的改造方法，有几十个县人民自下而上地实现了政权民主化，农协在乡村夺取了政权，县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公团联合会实际上掌握了县政，对省政府形成了两重政权的局面。这个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使唐生智集团感到威胁。唐生智集团是抓住军权、政权不放的。政权是要凭枪杆子夺取，并靠它支持的，我们手里枪杆子很少，所以政权实际上不在我们手里。

关于领导权的问题我谈了上面六点，其中实际经验主要是湖南的。可不可说，北伐战争，政治上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我看，基本可以说。但在实际上，我们在政府中的领导权很薄弱。尤其在军队中除个别部队外，我们没有掌握到领导权。北伐后期，武汉时期，豪绅买办阶级及其军事政治代表背叛革命，公开反共的时期，因为陈独秀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一步一步退让，把取得的领导权放弃了。敌人强大，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陈独秀主义占统治地位，这是大革命失败的主、客观主要原因。

关于领导权，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当然要放弃，不要争取。当时我们不少同志认为国民革命是共产党同左派共同领导，这种认识也是幼稚的观点。我们没有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的某种条件下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

有一个问题，即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当时没有认识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属于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民主革命联盟中的国民党的中间派，又分左、中、右，左派即革命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他们拥护三大政策，如孙中山、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等，他们同共产党一道，在民主革命联盟中属于左翼。右派靠近豪绅买办阶级，中派动摇于左、右派之间。蒋介石初期是属于中间派，中山舰事件后逐步由中间转化到豪绅买办阶级阵营，成为帝国主义走狗，但一个时期党的文献上仍常称他是中间派，把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政权笼统称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当时说武汉国民政府是小资产阶级政府，我看也是有问题的）。据我看，唐生智初期是中间偏左，后来向右转，附合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但没有参加实权；冯玉祥也如此。所以，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政治上又处于中间

派的地位，解放战争时期转到我们方面来。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陈独秀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是只讲团结，从右边取消了统一战线，放弃了领导权。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则是一切斗争，从左边取消统一战线，放弃领导权。

以上，是一些初步的看法和意见，还要进一步研究和学习，说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更希望把你们研究所得告诉我。

第四个问题：毛选一卷头两篇文章是不是可以说代表当时的正确路线，或者说是唯一的代表？

我看可以说是代表当时的正确路线，“唯一”的就不一定吧！当时比较正确的还有其他的领导同志，例如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这两篇文章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不是唯一的。（插话：有人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文章不是从生产方式分析的，每篇文章是不是都要从生产方式说起？都要从生产关系分析起？不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起是不是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篇文章是没有从列宁讲的划阶级的公式说起，也没有按那个标准去划分，但是根据我的记忆，他对每个阶级阶层都讲了它的经济地位。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不是以后为中国的现实所证明都错了呢？听说头一篇文章在编选时有修改，有哪些修改我还不知道。据我看，以后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又进一步作了分析，就觉得更完整了。

我赞成对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进行再研究，再分析，为了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求得完整、准确的理解，避免“凡是”，这样作有好处。

第五个问题：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作用。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有功劳的，有贡献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的政